

豪放詞
三百首



邓乔彬 选注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内容提要

豪放词以其阳刚区别于婉约词之阴柔。唐代敦煌曲子中有边塞词,多爱国英雄壮语。唐五代文人词中,李白《忆秦娥》、李煜降宋后所作,则以“气象”胜。北宋范仲淹、王安石等词人,以《渔家傲》《桂枝香》等开宋词苍凉悲壮、感慨深沉之风。苏轼变革词风,造就蔚为壮观的元祐词林。此后词之一脉绵延继承,豪迈之风不绝。本书所选之词,自唐至民国初年,以时间为序,所录皆是词之豪迈之作,使读者能够领略豪迈之风。词下加注,以便于读者欣赏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豪放词三百首 / 邓乔彬选注. —上海: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313-15565-8

I. ①豪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豪放派—词(文学)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I222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82240 号

豪放词三百首

选 注: 邓乔彬

出版发行: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邮政编码: 200030

出 版 人: 韩建民

印 制: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mm × 1194 mm 1/32

字 数: 486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313-15565-8/I

定 价: 58.00 元

地 址: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

电 话: 021-64074208

经 销: * 全国新华书店 *
15.5

印 张: 15.5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告读者: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联系电话: 0571-64361028

前言

一 阳刚、阴柔与豪放、婉约

“豪放”的源头实出于阳刚阴柔说。我国古代哲人以阴阳二分之共相看待宇宙之万殊，导致阳刚、阴柔观念的产生。由哲学而及于文艺，使风格学得以潜生并确立。

《周易》曾明确提出阴阳、刚柔的对立统一范畴，且有将二者结合而论之势。《说卦》云：“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”，“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”。而《周易》“经”的创作过程，首先就经历了阴阳概念产生这一阶段。“八卦”的创立，是“观物取象”的结果，其中的《乾》卦象征“天”，喻示“刚健”，《坤》卦象征“地”，喻示“柔顺”。“盈乎天地之间，无非一阴一阳之理”（《朱子大全·易纲领》）。《周易》这一认识，对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特性具有普遍的涵括性和指导意义，入于文艺领域，就产生了与阴阳、刚柔密切相关的概念，成为美学以至文艺风格学的重要内容。

《尚书·虞书·舜典》除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这著名的十二字外，关于命夔典乐又有“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无虐，简而无傲”之说，似乎隐约可见涉及文艺的“刚”“柔”说的出现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的季札观乐，在观乐知政的总体精神下，表现出以大为美的美学观，并相应地以辩证眼光初涉风格问题。如书中所载：“为之歌《齐》，曰：‘美哉！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大公乎？国未

可量也。”“为之歌《秦》，曰：‘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’为之歌《魏》，曰：‘美哉，泱泱大国乎！大而婉，险而易行，以德辅此，则明主也。’”“为之歌《大雅》，曰：‘广哉，熙熙乎！曲而有直体，其文王之德乎？’”都可见对“大”的赞美。而就《左传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等先秦典籍看，可见先秦时代的审美观似乎更重在“刚”“大”一侧。

郑振铎曾认为，“汉代乃是诗思最消歇的一个时代”^①。与之相关，汉代的文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诗、骚的解释、论评。由于汉人重在对先秦典籍的整理、研究，经学笼罩下的美学、文艺学，很难禀承阳刚、阴柔之说绽出花朵。直到汉末刘劭《人物志》的出现，才改变品核公卿、裁量执政的清议之风，深入到人物的精神、才性，启发了魏晋“文气”说的产生。《后汉书》载孔融荐祢衡书，已有“飞辩骋辞，溢气坌涌”^②之说。曹丕在评论“建安七子”的“徐幹时有齐气”，“应玚和而不壮，刘桢壮而不密，孔融体气高妙”^③的同时，又发其著名的“文气”之论：“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。”^④尽管他本人未加说明，但“清”者显然偏在阳刚，“浊”者偏在阴柔。后来刘勰所说的“才有庸俊，气有刚柔”，“风趣刚柔，宁或改其气”，“气以实志，志以定言，吐纳英华，莫非情性”^⑤，沈约的“民稟天地之灵，含五常之德。刚柔迭用，喜愠分明”^⑥，

① 郑振铎：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《郑振铎全集》第七卷，第37页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② 范晔：《后汉书》卷一一〇下《祢衡传》，《二十五史》，第103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1986年版（下同）。

③ 曹丕：《典论·论文》，转引自郭绍虞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第1册，第158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（下同）。

④ 曹丕：《典论·论文》，转引自郭绍虞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第1册，第158页。

⑤ 刘勰著，范文澜注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506～507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。

⑥ 沈约：《宋书》卷六七《谢灵运传》，《二十五史》，第1831页。

都是曹丕所论的继续阐发。

与文气说约略同时，魏晋的人物品评和山水赏会，也大体有区分刚柔之势。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所载的王武子、孙子荆“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”：“其地坦而平，其水淡而清，其人廉且贞”，“其山嵒巍以嵒峨，其水洄渌而扬波，其人磊砢而英多”^①，是将人物与山水相联系，且有刚柔之大概。而在《世说新语·赏鉴》中亦有用“岩岩清峙，壁立千仞”，“谡谡如劲松下风”与“荀子秀出，阿兴清和”来评人的，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中的“濯濯如春月柳”，则更见刚柔之别。同样，山水赏会中的“江山辽落，居然有万里之势”，“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”，与“翳然林水”“日月清朗”（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），也显见不同。

风格学与文气说密切相关。对文学做风格的较详细区分，当始于刘勰，他在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中提出八体之分：典雅、远奥、精约、显附、繁缛、壮丽、新奇、轻靡。其后，唐代日本僧人遍照金刚《文镜秘府》之《论体》，唐僧皎然《诗式》之以十九字概括诗体，及传为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等，各有所论，宋代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继有发展，然而都可看作是刘勰所论的推衍。到了清人姚鼐，终于由博返约，以《易·系辞》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为理论根据，明确地将众多的风格之分归纳为阳刚、阴柔二类。其《复鲁挈非书》云：“鼐闻天地之道，阴阳刚柔而已。文者，天地之精英，而阴阳刚柔之发也……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，则其文如霆，如电，如长风之出谷，如崇山峻崖，如决大川，如奔骐驎；其光也如杲日，如火，如金鏐铁；其于人也，如冯高视远，如君而朝万众，如鼓万勇士而战之。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，则其文如升初日，如清风，如云，如霞，如烟，

① 刘义庆著，徐震堉校笺：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，第47页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（下同）。

如幽林曲涧，如沦，如漾，如珠玉之辉，如鸿鹄之鸣而人寥廓。其于人也，謇乎其如叹，邈乎其如有思，暖乎其如喜，愀乎其如悲。”^①

豪放、婉约二辞进入文艺评论领域较晚，但用于评论人物则至迟已在南北朝，而二辞之从字源考释或语义探寻，亦有刚、柔之别在。

“豪”本指豪猪等动物身上的刺，亦指刚硬的长毛。如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云：“（谿明之山）有兽焉，其状如貍而赤豪。”故《说文》即以“豪”为豪猪项脊间如笔管状的长毛，段注以“豪俊”为其引申义。“鬣如笔管者”，特征当然在“刚”。与之相对，《说文》释“婉”为“顺”，自有“柔”意。而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的“姑慈而从，妇听而婉”，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的“婉而成章”，皆有宛转、和顺之意，不悖于“柔”。“放”之本义为“逐”，后渐有恣纵、放任等义。而“约”之基本义项也从“缚”引申为俭约、约束等。“豪”“放”二字连用以评人，较早地见于《魏书·张彝传》：“彝少而豪放，出入殿庭，步眄高上，无所顾忌。”^②而“婉”“约”连用之论人，可见于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“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，故二千里候之”一则的注。注中引《司马徽别传》：“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，初不辨其高下，每辄言‘佳’……其婉约逊遁如此。”^③张彝“步眄高上，无所顾忌”，司马徽“括囊不谈议”“逊遁”，可见“豪放”与“婉约”之别其基本点就在刚、柔，又益之以显、隐。若参之以杜甫《壮游》诗的“性豪业嗜酒，嫉恶怀刚肠”，和《新唐书·李邕传》的“邕资

① 姚鼐：《复鲁挈非书》，《惜抱轩诗文集》卷六，第93~9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。

② 魏收：《魏书》卷六四《张彝传》，《二十五史》，第2333页。

③ 刘义庆著，徐震堉校笺：《世说新语校笺》，第36~37页。

豪放，不能治细行”^①，“豪放”又有“粗豪”的涵义。而从《国语》的“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，故婉约其辞，以从逸王志”^②，到唐人张彦远《梁庾元威论书》的“（孔）敬通又能一笔草书，一行一断，婉约流利，特出天性”^③，可见“婉约”之义已从卑顺宛转发展为细致柔美。

下面专就“豪放”一辞进入词学批评领域做一考察。

《二十四诗品》，列有“豪放”一品，其比物取象如下：

观花匪禁，吞吐大荒。由道返气，处得以狂。天风浪浪，海山苍苍。真力弥满，万象在旁。前招三辰，后引凤凰。晓策六鳌，濯足扶桑。

郭绍虞所作《集解》云：“观花匪禁，即‘看竹何须问主人’之意，自见其放。吞吐大荒，即‘吞若云梦者八九，于其胸中曾不蒂芥’之意，自见其豪。”“由道返气，言豪气是集义所生，根于道，故不馁。处得以狂，言忘怀得失，才能自得，超于世，故无累。不馁无累，自近豪放。”当中四句，昭示意象，言其感受，皆不难理解。“前招三辰，后引凤凰”，足见手摘星辰、不可方物之豪气。最后二句，暗用《列子》一钧而连六鳌故事，又袭晋左思《咏史诗》“振衣千仞冈，濯足万里流”句意，且如杨廷芝《诗品浅解》云：“策六鳌，豪之至；濯扶桑，放之至。”^④四十八字之中，“由道返气，处得以狂”的“言豪气是集义所生”，“不馁无累，自近豪放”，尤见新意，在注入孟子“养气说”内容同时，又回到曹丕“文气说”之初。至如以意象昭示境界，更便于我们对“豪放”的风格特征作总体性的理解、把握。

① 欧阳修等：《新唐书》卷二〇二《李邕传》，《二十五史》，第4741页。

② 见徐元浩撰，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：《国语集解》，第539～540页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。

③ 张彦远：《梁庾元威论书》，《法书要录》卷二，第60页，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。

④ 以上见司空图著，郭绍虞集解：《诗品集解》，第23～24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。

以“豪放”评词，恰是被目为北宋“豪放派”领袖的苏轼之创。他的《与陈季常》曰：“又惠新词，句句警拔，诗人之雄，非小词也。但豪放太过，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。”^①而对于苏轼词风格本身，论者亦多有“豪放”之评。首以“豪放”论苏轼的是南宋初的曾慥，他在绍兴辛未（1151）曾以“豪放风流之不可及也”^②评东坡词。到明人张綖，在其《诗馀图谱·凡例》中，乃有“豪放”与“婉约”对举之论：“词体大略有二：一体婉约，一体豪放。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，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”，并云：“苏子瞻之作，多是豪放。”^③

近于豪放之意的评论甚多。胡寅《酒边集序》先言“文章豪放之士，鲜不寄意于此者”，然后才说苏轼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”^④，自然应是“文章豪放之士”了。陆游、沈义父等人也以“豪放”论苏轼。其实，即使不是明言“豪放”，也能充分意识到苏轼风格与传统词作之别。如汪莘《方壶诗馀自序》的词史三变说，即以“至东坡而一变，其豪妙之气，隐隐然流出言外”，论苏轼而有一“豪”字^⑤。俞文豹《吹剑续录》所载东坡在玉堂时，发问于善讴之幕士^⑥，据说这位善歌的幕士就是袁绶，他道出了苏词中最见雄壮、开阔意境的作品与柳词的区别，而这种区别，其实就是豪放与婉约的区别。刘辰翁云：“词至东坡，倾荡磊落，如诗如文，如天地奇观。”^⑦元好问《新轩乐府引》更明

① 苏轼：《与陈季常》，《苏轼全集·文集》卷五三，第1761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

② 曾慥：《东坡词拾遗跋》，《词籍序跋萃编》，第61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（下同）。

③ 张綖：《增正诗馀图谱·凡例》，明万历刊本。

④ 胡寅：《酒边集序》，《词籍序跋萃编》，第168～169页。

⑤ 汪莘：《方壶诗馀自序》，《词籍序跋萃编》，第270页。

⑥ 见俞文豹撰，张宗祥校订：《吹剑录全编》，第38页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。

⑦ 刘辰翁：《辛稼轩词序》，《词籍序跋萃编》，第201页。

确而形象地道出了苏词“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”。时至今日，或许仍有论者从统计学的角度否定苏词“豪放”，但其立意和风格的创新，难道不是给词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东西？元好问所论是具眼而又持平之见。到张綖为《诗馀图谱·凡例》作按语，又从众多的风格类型中挑出婉约与豪放，以之为词体之“大略”，而对二者的阐释则实为刚柔之别，他所说的“气象恢宏”偏于“大”，又如前所说，“大”者往往与“刚”相关；“词调蕴藉”虽偏在“蓄”“约”，亦如前所云，常与“柔”密不可分。

由刘勰而至姚鼐，再转到张綖所论，对词的风格学探讨，应具有启示性。唐宋词“创调数百，列体盈千”，后世又继有发展，清代的词家、词作，数量更远逾于宋，使得历来对著名词人风格的评价，林林总总，指不胜数。举隅而言，清人陈廷焯所析唐宋词十四体，近人詹安泰的八种风格之论，就是对众多风格类型的归纳。但诚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既列诗之“九品”，又曰“其大概有二：曰优游不迫，曰沉著痛快”^①。背后仍有阳刚、阴柔说之影响。以此相似相揆，无论是十四体还是八种风格，亦可返于张綖“一体婉约，一体豪放”的“词体大略有二”之分。虽实际上苏轼词并不“多是豪放”，而仅有少数可当此称，但因变革了词的传统风格，为词史提供了新的“这一个”，故就“大概”论其归属，也只能以苏词为“豪放”，而这，实际上就是回归于古老的阳刚阴柔说。

借助于由刘勰而至姚鼐的论述，对词的风格学探讨，应具有启示性。如果不是作社会学的、政治性的评判，流为简单、粗暴的论断，作非此即彼的取舍，我们不妨对豪放的具体内涵作些分析，真正认识并合理地肯定豪放词的价值。

^① 严羽著，郭绍虞校释：《沧浪诗话校释》，第7~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。

“豪放”作为两分法的“大概”“大略”之一，首先就具有美学、风格学的意义。试取被目为“豪放”的词人作品看，足可证明之。如被认为导宋代豪放词先声的范仲淹《渔家傲》，以塞下、寒秋、边声、千嶂、长烟、落日、孤城、羌管、严霜的诸般意象，一改花前月下、院落笙歌的传统题材，表现了守边御敌的抱负、情怀，营造出苍凉悲壮的意境，让人有慷慨生哀之感。苏轼的名篇《念奴娇》（赤壁怀古）自是关西大汉执铁板演唱之所宜。又如：

江江西来，高楼下、葡萄深碧。犹自带、岷峨雪浪，锦江春色。——《满江红》

堪笑兰台公子，未解庄生天籁，刚道有雌雄。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——《水调歌头》

我梦扁舟浮震泽，雪浪摇空千顷白。觉来满眼是庐山，倚天无数开青壁。——《归朝欢》

其笔力之刚健排奭，造境之开阔雄奇，确令人有万斛泉源奔涌、挟海上风涛云气之感。苏词之中，既有游仙之作如“古来云海茫茫，道山绛阙知何处！”“行尽九州四海，笑纷纷、落花飞絮”（《水龙吟》）的偏于“虚”，又有出猎之作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”（《江城子》）的偏于“实”，二者都近于“雄”。而“路漫漫，玉花翻，云海光宽，何处是超然？”（《江城子》）“桂魄飞来，光射处、冷浸一天秋碧”，“水晶宫里，一声吹断横笛”（《念奴娇》），则偏于“清”，与著名的《水调歌头》（中秋词）相近。至如《定风波》的“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“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《浣溪沙》的“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休将白发唱黄鸡”，则与《念奴娇》（赤壁怀古）共有一个“旷”字。无论是“雄”，是“清”，是“旷”，都差可以“豪放”概之。

与苏轼并称的辛弃疾，不但笔下的山水形象一改“杏花春雨江南”式的轻柔、幽美，而且健笔凌云，写得气势飞动。如《摸鱼儿·观潮上叶丞相》写潮水：

望飞来、半空鸥鹭，须臾动地鼙鼓。截江组练驱山去，鏖战未收貔虎。

《水调歌头·和王正之右司吴江观雪见寄》写下雪：

造物故豪纵，千里玉鸾飞。等闲更把、万斛琼粉盖玻璃。好卷垂虹千丈，只放冰壶一色，云海路应迷。

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的西湖边，飞来峰并非一拳危石，《满江红·题冷泉亭》写道：

谁信天峰飞堕地，傍湖千丈开青壁。是当年、玉斧削方壶，无人识。

他移情于山，竟然是：

青山欲共高人语，联翩万马来无数。——《菩萨蛮·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》

叠嶂西驰，万马回旋，众山欲东。——《沁园春·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》

他泄狂于醉，竟然是：

昨夜松边醉倒，问松：“我醉何如？”只疑松动要来扶，以手推松曰：“去！”——《西江月·遣兴》

当年的抗金形势：

汉家组练十万，列舰耸层楼。谁道投鞭飞渡，忆昔鸣镝血污，风雨佛狸愁。——《水调歌头·舟次扬州和人韵》

自己的斗争经历：

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……——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》

由于主战而倍遭压抑，辛弃疾常以梦境、神话来解脱思想羁绊：

我志在寥阔，畴昔梦登天。摩挲素月，人世俯仰已千年。

——《水调歌头·赵昌父七月望日……》

甚至进而幻想：

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斫去桂婆娑，人道是清光更多。——《太常引·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》

可以认为，被视作“坡公少子”的辛弃疾，较坡公更“豪”更“放”，也更接近姚鼐“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”的诸般形容。其他词家的豪放词虽不及稼轩抚时感事，慷慨悲歌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但较之“当行”之作，其总体风格却也无疑偏在阳刚一侧。

二 风格即人

我国说文如其人，西方说风格即人，可见人的抱负、个性、学识等对风格具有决定性影响。

前面对“豪放”一辞作源流讨论时，曾涉张彝、李邕等人传记及杜诗所言，可见与人的性格密不可分。苏轼《与陈季常》首括“豪放”评词，这个陈季常即陈慥，号方山子，苏轼《方山子传》谓其“少时慕朱家、郭解为人，闾里之侠皆宗之。稍壮，折节读书，欲以此驰骋当世。然终不遇”。其“少时使酒好剑，用财如粪土”，十九年前，“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。自谓一世豪士”，如今“庵居蔬食，不与世相闻”，虽洛阳故家“园宅壮丽与公侯等。河北有田，岁得帛千匹”，却“皆弃不取，独来穷山中”^①。以陈慥如此为人，作“豪放太过”之词，恃其“诗人之雄”，自是偏于阳刚，与传统的“风云气少，儿女情多”的“小词”不同。

^① 苏轼：《方山子传》，《苏轼全集·文集》卷一三，第922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

以苏轼词为豪放、豪妙或恢宏，也是取决于他的个性、资质、禀赋。胡寅论苏轼，有“逸怀浩气，超然乎尘垢之外”一语，与其说是接受者所感，不如说是苏轼本人真性情的自然发露，王若虚认为苏轼“雄文大手，乐府乃其游戏”，原因是“天资不凡，辞气迈往，故落笔皆绝尘耳”^①。张綖论婉约、豪放之别且举苏轼、秦观为代表，明言“然亦存乎其人”。清人李调元辨苏词之是否诸律，持“才大不肯受束缚”^②之见。邓廷桢也认为：“东坡以龙骧不羁之才，树松桧特立之操，故其词清刚隽上，囊括群英。”^③王鹏运则云：“北宋人词……唯苏文忠之清雄，复乎轶尘绝迹，令人无从步趋。盖霄壤相悬，宁止才华而已？其性情，其学问，其襟抱，举非恒流所能梦见。”^④所以，才具、节操、性情、学问、襟抱，是苏轼“天资不凡”加以后天修养的几个主要因素，其“辞气迈往”“落笔绝尘”，是出于必然，也出于自然，是他人所难做到的。

如对苏词之豪放作认真辨析，能真正称为豪放词仅是“以诗为词”的初期所作，如《江城子》（密州出猎）。黄州以后词，虽如《念奴娇》（赤壁）之外在笔力极其雄豪，有“天风浪浪，海山苍苍。真力弥满，万象在旁”之概，但其内在精神意旨已转为旷达。《二十四诗品·旷达》云：

生者百岁，相去几何。欢乐苦短，忧愁实多。如何尊酒，日往烟萝。花覆茅檐，疏雨相过。倒酒既尽，杖藜行歌。孰不有古，南山峨峨。^⑤

① 王若虚：《滹南诗话》卷三，丁福保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第517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② 李调元：《雨村词话》卷一，唐圭璋编《词话丛编》，第1394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③ 邓廷桢：《双砚斋词话》，唐圭璋编《词话丛编》，第2529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④ 王鹏运：《半塘遗稿》，转引自龙榆生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，第12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⑤ 司空图著，郭绍虞集解：《诗品集解》，第41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。

郭绍虞的注释有云：“人之生也不过百年……况此百岁中欢乐快意之时每苦其短少，而忧愁失意之日实觉其繁多。与其日绊于尘世之中，自投苦境，何如置一切于度外，手携一尊之酒，日往于飞烟带梦之地以自适乎？”其《浅解》则云：“花覆茅檐，瞻物色之华，乐安居之况；疏雨相过，有化机之感，无尘缘之牵。则无一时不乐也。”又云：“古，故也。有古，犹言自古皆死也。人孰不死，而惟南山峨峨，得以长存。悟得此理，则对欢乐不会苦其短，对忧愁亦不会嫌其多，乃真旷达矣。”^①以苏轼词与之对照，被认为是豪放者，其实更与旷达为近。如《定风波》（莫听穿林打叶声）更是郭绍虞所释的“与其日绊于尘世之中，自投苦境，何如置一切于度外”，是“倒酒既尽，杖藜行歌”的“旷达”。无论是《念奴娇》一类，还是《定风波》一类，外在表现不同，内在精神却是一致的，称之为“豪放”，不如说是“旷达”更宜。

苏轼在黄州以后，仅一度入翰林，却很快又牵累于党争，一再被贬，虽然豪放由性格而定，苏轼性格开朗，但在远逐的生涯中亦无豪放之由，故只能以佛禅老庄成其旷达。所以，豪放与旷达二者都本属性格，但若用于风格的品鉴，虽都入二十四品之中，豪放易于外现为风格，旷达则易于留在性格范畴内而难以被认作风格。

豪放之外，还有张炎以“清丽舒徐”论苏词，俞彥更以豪放为贬义而说：“子瞻词无一语著人间烟火，此自大罗天上一种，不必与少游、易安辈较量体裁也。其豪放亦止大江东去一词。何物袁绹，妄加品陟，后代奉为美谈，似欲以概子瞻生平。”^②以

① 以上见司空图著，郭绍虞集解：《诗品集解》，第41~42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。

② 俞彥：《爱园词话》，唐圭璋编《词话丛编》，第402页。

“清丽”或“不食人间烟火”对比《二十四诗品》，其中《清奇》一品的“载瞻载止，空碧悠悠。神出古异，澹不可收。如月之曙，如气之秋”^①，《飘逸》的“落落欲往，矫矫不群”^②，应该说是比较接近的。而且也比“豪放”更切合、更接近苏词的主体风格。

无论是豪放、旷达还是清丽、雄奇，抑或“大罗天上一种”，它们所共同的，都是“天资不凡”所体现出的“辞气迈往”，既然风格品鉴可以由多返约，回归于阳刚阴柔说，辨析苏词豪放而引起的多种风格之见，也应可作此返约之论。

再看与苏轼并称的辛弃疾。

辛弃疾幼时，家乡就已沦陷，但他一直秉承儒家的夷夏观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，“登高望远，指画山河，思投衅而起，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”^③，曾两随计吏抵燕山，谛观形势。完颜亮南侵时，他二十二岁，“鸠众二千，隶耿京为掌书记，与图恢复，共籍兵二十五万，纳款于朝”^④。《宋史》本传载其与党怀英“始筮仕，决以蓍，怀英遇《坎》，因留事金；弃疾得《离》，遂决意南归”^⑤。在耿京义军中，他追获窃印而逃的叛徒义端和尚，斩首归报。在他“奉表南归”时，叛徒张安国杀害耿京，他“赤手领五十骑，缚取于五万众中，如挟毚兔，束马衔枚，间关西奏淮，至通昼夜不粒食。壮声英概，儒士为之兴起”，使得遇敌即逃的“圣天子”因此而“一见三叹息”^⑥。南归后，辛弃疾在二十六岁时奏

① 见司空图著，郭绍虞集解：《诗品集解》第30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。

② 见司空图著，郭绍虞集解：《诗品集解》第39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。

③ 辛弃疾：《美芹十论·序》，邓广铭辑校，辛更儒笺注：《辛稼轩诗文集注》卷上，第1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。

④ 辛弃疾：《美芹十论·序》，邓广铭辑校，辛更儒笺注：《辛稼轩诗文集注》卷上，第1页。

⑤ 元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四〇一《辛弃疾传》，《二十五史》，第6547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1986年版。

⑥ 洪迈：《稼轩记》，转引自邓广铭辑校，辛更儒笺注：《辛稼轩诗文集注·附录》，第267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。

进《美芹十论》，后又上《九议》于宰相虞允文，还向朝廷上《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》《谏议民兵守淮》两疏，展现出他作为军事家的杰出战略思想。他曾派探子深入金朝，根据所得情报，分析形势，上奏君相，提出“仇虏六十年必亡，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”（周密《浩然斋意抄·镇江策问》）。南宋覆亡后，周密回顾辛弃疾的滁州奏议，感叹“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”（《浩然斋意抄·镇江策问》）。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失败后，有人认为辛弃疾曾参与论证而难辞其责，而程秘却在其《丙子轮对劄子》中既痛心于“百年教养之兵，一日而溃；百年葺治之器，一日而散；百年公私之盖藏，一日而空；百年中原之人心，一日而失”。因曾亲聆辛弃疾关于论兵、用谋之见，自己又“至于淮甸，目击横溃”，而公正地认为“无一而非弃疾预言于二年之先者”^①。所以，刘克庄《辛稼轩集序》是从气节之士及战略家、政治家的角度论辛弃疾：

辛公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。乾道、绍熙奏篇及所进《美芹十论》、上虞雍公《九议》，笔势浩荡，智略辐凑，有权书衡论之风。其策完颜氏之祸，论请绝岁币，皆验于数十年之后。^②

这样一位兼具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才干的人物，因自身的特殊经历、背景，他最大的理想是：

道清都帝所，要挽银河仙浪，西北洗胡沙。回首日边去，云里认飞车。——《水调歌头》（寿赵漕介庵）

袖里珍奇光五色，他年要补天西北。且归来谈笑护长江，波澄碧。——《满江红》（建康史致道留守席上赋）

但是，他只能感叹：

^① 程秘：《丙子轮对劄子》，转引自邓广铭辑校，辛更儒笺注：《辛稼轩诗文集注·附录》，第27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。

^② 刘克庄：《辛稼轩集序》，《词籍序跋萃编》，第200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。